

双边政治关系改善为何会降低区域贸易协定深度

孙楚仁 赵家敏 徐锦强

摘要：伴随着区域贸易协定的快速发展，协定深度问题逐渐受到关注。本文使用 Heckman 两阶段模型实证分析了双边政治关系对区域贸易协定深度的影响。研究表明，虽然双边政治关系的改善有利于提高国家间签订区域贸易协定的概率，但却降低了签订协定的深度。双边政治关系疏远的两国签订深层次区域贸易协定的动机在于通过正式的协定规则降低双边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从而提升两国贸易流量和加深价值链的合作程度。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中国缔结深层次区域贸易协定有利于增强国家间贸易互信，弥补双边国家在政治关系上的分歧，从而构建深度的双边、多边和区域合作。

关键词：双边政治关系；区域贸易协定；协定深度；贸易；价值链合作

[中图分类号] F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70 (2022) 11-0104-19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逆全球化思潮越发汹涌，新冠疫情冲击全球价值链，导致全球贸易格局面临重大变革（卢晓菲和章韬，2020）^[1]。以 WTO 为基石的多边贸易谈判受阻，WTO 成员国纷纷转向寻求双边或者区域合作，并使得相对灵活、自由的区域贸易协定大量出现并快速发展（Baier et al., 2014）^[2]。在区域贸易协定数量飞速增长的同时，协定涵盖的政策范围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更深水平的区域贸易协定不断出现，扩大了早期协定所涵盖的政策领域，同时将协定内容扩展到更为广泛的知识产权和标准等边界后层面，呈现出区域贸易协定深度一

[收稿日期] 2022-07-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构建与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研究”（18ZDA039）；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对外援助对中国与受援国全球价值链合作、嵌入和利益分配的影响研究”（2022A1515011206）；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双边政治关系对贸易协定深度的影响研究”（21GWCXXM-078）；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跨国并购与创新战略研究中心专项资助“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援助与企业跨国并购研究

[作者信息] 孙楚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家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徐锦强（通讯作者）：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博士研究生，电子信箱 382267675@qq.com

体化的趋势(张中元, 2019)^[3]。签订更深水平的区域贸易协定, 有助于优化区域内要素资源配置, 推动区域内各国贸易与投资增长及合作程度的加深, 从而提升区域一体化程度以抵御外部冲击。因此, 立足于区域贸易协定条款不断深化的发展前景, 学者们从全球价值链(GVC)和增加值贸易(卢晓菲和章韬, 2020; Lawrence, 1996^[4]; Baldwin, 2011^[5]; Orefice and Rocha, 2014^[6]; Damuri, 2012^[7]; Ruta, 2017^[8])等角度探讨推动区域贸易协定深度发展的动力, 为协定深度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然而, 目前尚未有文献关注双边政治关系对区域贸易协定深度的影响。此外, 考察区域贸易协定深度影响因素的文献, 都未能将双边政治关系对区域贸易协定的签订以及深度两者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研究, 存在着“样本选择”的问题。

鉴于此, 本文采用1971—2015年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和世界银行的贸易协定内容数据库, 实证检验双边政治关系对区域贸易协定深度的影响。研究发现, 双边政治关系改善有利于促进国家间缔结区域贸易协定, 但是在已经确定要缔结协定的前提下, 双边政治关系较差的国家倾向于签订更深层次的区域贸易协定。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问题处理的结果同样支撑该结论。

与本文直接相关的文献有两类: 第一类是关于区域贸易协定签订影响因素的研究。Baier和Bergstrand(2004)^[9]发现国家间地理距离、经济实力以及资本—劳动禀赋差异会对区域贸易协定签订产生显著影响。Egger和Larch(2008)^[10]、Chen和Joshi(2010)^[11]、Baldwin和Jaimovich(2012)^[12]、Baier等(2014)的研究都认为, 现存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和签署新协定均会激励非成员国缔结协定。此外, GVC贸易和移民网络也是推动国家间缔结区域贸易协定的重要因素(Fontagné and Santoni, 2018^[13]; 铁瑛和蒙英华, 2020^[14])。在探讨影响区域贸易协定签订的研究中, 还有一类文献着眼于政治因素, 发现国际政治关系改善会促进国家之间签订区域贸易协定(Gowa and Mansfield, 1993^[15]; Mansfield and Bronson, 1997^[16]; Martin et al., 2012^[17]; Plouffe and Van Der Stermen, 2016^[18])。

第二类文献是关于区域贸易协定深度影响因素的研究。Lawrence(1996)、Baldwin(2011)、Orefice和Rocha(2014)、卢晓菲和章韬(2020)的研究都发现, GVC贸易的深化发展对深层次区域贸易协定存在催化作用。Antràs和Staiger(2012)^[19]认为, 离岸外包使得各国无法继续依靠WTO传统贸易规则协调跨国贸易利益冲突, 亟需深度一体化的区域贸易协定以适应新型全球化贸易格局。

与以往研究相比, 本文的创新与特色主要有三点: (1) 已有文献虽关注到政治因素对区域贸易协定的影响, 但往往以协定签订为研究点, 本文则关注双边政治关系对协定深度的影响, 进一步扩展了该方向的研究范围; (2) 以往研究大多使用军事联盟、战争等特定事件和高层外交关系等因素衡量双边政治关系, 不能完

全覆盖两国政治关系的全貌。而本文运用的各国就联合国大会各项议题的投票行为数据可以代表一国对相关议题的政治偏好，并反映两国的国际政治倾向，因此能够更加客观地衡量双边政治关系；（3）本文从国家利益理论和制度理论角度探讨双边政治关系与区域贸易协定的联系，认为作为经济人的国家为追求国家利益，倾向于与其他国家进行经贸合作，同时在制度理论框架下将双边政治关系视为非正式制度、将区域贸易协定视为正式制度，从而分析两者的相互补充作用。

二、理论框架与假说

（一）制度理论视角下双边政治关系和区域贸易协定的关系

North（1990）^[20]认为制度是人为设计并用于限制人们之间互动的因素。从国家层面分析，制度也是用于限制国家之间互动的因素。制度可以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作为明文规定的规章制度，通常以具体条款形式存在，并具备专门机构监督其实施，因而正式制度具有强制约束力（Scott，1995）^[21]。非正式制度形成于国家之间的长期往来，是需要各国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具有自发性和非强制性等特点（马智胜和马勇，2004）^[22]。由于区域贸易协定是缔约国为满足本国利益、加强经贸往来等需求而主动、自发订立的制度，并设置立法、行政及争端解决机构保障协定的推行，因此可以归属于正式制度。而双边政治关系形成于国家外交活动，且并未设立独立机构维护两国外交关系，所以双边政治关系符合非正式制度的定义。

1. 双边政治关系与区域贸易协定签订概率

双边政治关系与区域贸易协定相辅相成，且政治关系友好的两国开展经贸往来与合作的意向会更强烈。当双边政治亲密度达到一定程度时，为实现经贸合作，国家间会签订协定推动经济相互依赖。可见，政治关系是推动区域贸易协定签订的重要因素（Mansfield et al.，1999^[23]；孙玉红，2008^[24]；祝丹丹，2020^[25]）。因此，本文认为在双边政治关系达到一定亲密度的情况下，两国会倾向于签订区域贸易协定。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说。

假说1：双边政治关系越亲密的国家，签订区域贸易协定的概率越高。

2. 双边政治关系与区域贸易协定深度

制度理论表明，非正式关系的强制性不足会对其影响范围造成限制，从而需要利用正式制度管理大规模组织，补充非正式制度失效时对个体的约束力（王询，2000^[26]；马智胜和马勇，2004）。并且正式制度具有一定强制性的法律保障，可以避免非正式制度在推行过程中出现混乱状态（李光宇，2009）^[27]。因此，正式制度为非正式制度的稳定和改进了提供了条件（孙家良，2004）^[28]。在国家进行制度安排时，为了解决非正式制度约束力不足所造成的问题，会相应增强正式制度的约束力。基于上述理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均会影响国家间贸易信任和政策不确定

性,并通过贸易成本影响双边经贸关系(如贸易量、价值链合作等)^①。因此,为降低贸易成本,各国会考虑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进行权衡。当非正式制度(如双边政治关系)的约束力不足以推动贸易成本下降时,各国会增强正式制度的约束力(如区域贸易协定深度提升),通过提升国家间贸易信任和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巩固双边经贸关系(钱学锋和龚联梅,2017)^[29]。从近年来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区域贸易协定的签订来看,深度区域贸易协定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双边政治关系疏远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依据这一逻辑,当国家间的双边政治关系(非正式制度)存在问题影响到经贸合作时,可以通过提高区域贸易协定(正式制度)深度增强其对成员国的约束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两国政治关系的不足,从而推动国家间的经贸合作发展。换言之,当国家间的双边政治关系已经达到确定签订区域贸易协定的程度后,双边政治关系还会影响到协定的深度。同时,很多研究也探索过双边政治关系与区域贸易协定之间的互补作用。Schiff和Winters(1998)^[30]、Kastner(2005)^[31]均认为,双边政治关系较差的国家会通过加强在贸易上形成的经济相互依赖以改善政治关系。因而,本文认为双边政治关系较为疏远的国家更需要提升区域贸易协定的深度以缓解政治关系上的疏离,通过增强两国互信程度从而巩固经贸联系。基于以上论述,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说。

假说2:在已经确定要签订区域贸易协定的前提下,双边政治关系较疏远的两国会倾向于签订更深水平的区域贸易协定,双边政治关系较亲密的两国会倾向于签订一般深度的区域贸易协定。

(二) 国家利益理论视角下区域贸易协定形成的原因

国家利益理论认为,国家出于理性决策,倾向于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不同于国家内部依赖的政府治理,国家间会通过建立合作制度以避免囚徒困境,如在现存的区域贸易协定中,非成员国为避免增加今后与区域内国家交易的成本,倾向于融入或建立新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Baldwin and Jaimovich, 2012)。由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和迫切需要,经济利益又是一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洪邮生,2004)^[36],因此,从国家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各国都倾向于进行经贸合作以促进本国发展,如通过签订区域贸易协定实现互惠共赢。张玉环和李巍(2014)^[37]的研究指出,国家签署区域贸易协定的动机主要是服务于本国的经济利益。实施区域贸易协定能够带来大量传统收益,如:降低区域内贸易和投资障碍,改善投资环境以及降低贸易风险等;此外,还会产生重要的非传统收益,如:锁定贸易自由化

^①在影响贸易成本的诸多因素中,贸易信任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尤为重要。其中,贸易信任能够降低缔约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原因在于:信任在事前能够减少各方为获得交易信息所需的成本(刘凤委等,2009)^[32],在执行阶段,信任能够决定在多大程度上监督和强制执行合同(赵家章和池建宇,2014)^[33]。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则能够影响国家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造成贸易成本波动,从而改变企业对于外贸交易成本的预期。如马野青和阮永嘉(2022)^[34]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通过降低贸易双方对交易成本的预期,并减少企业为进入进出口市场所支付的沉没成本,从而降低企业的出口门槛(Handley and Limão, 2015)^[35],最终推动两国贸易发展。

方向、巩固改革成果和提供保险保障等 (Perroni and Whalley, 2000^[38]; Fernandez and Portes, 1998^[39])。

总而言之, 区域贸易协定能够增强成员国之间的互信程度以实现合作共赢 (陈广汉和杨柱, 2020)^[40]。并且, 深度区域贸易协定能够通过法律条款规范成员国的贸易行为, 降低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 (刘斌和李川川, 2021)^[41]。相比浅层次的区域贸易协定, 深层次的区域贸易协定对贸易量和 GVC 贸易的促进效应更显著 (Hass, 1964^[42]; Hofmann et al., 2017^[43]; 彭冬冬和林珏, 2021^[44])。具体而言, 签订区域贸易协定并随着协定深度的增加, 国家间贸易壁垒会随之下降, 从而促进贸易量增加 (Hass, 1964) 和价值链合作程度的提升 (Laget et al., 2020^[45]; 彭冬冬和林珏, 2021)。综上所述, 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说。本文的理论逻辑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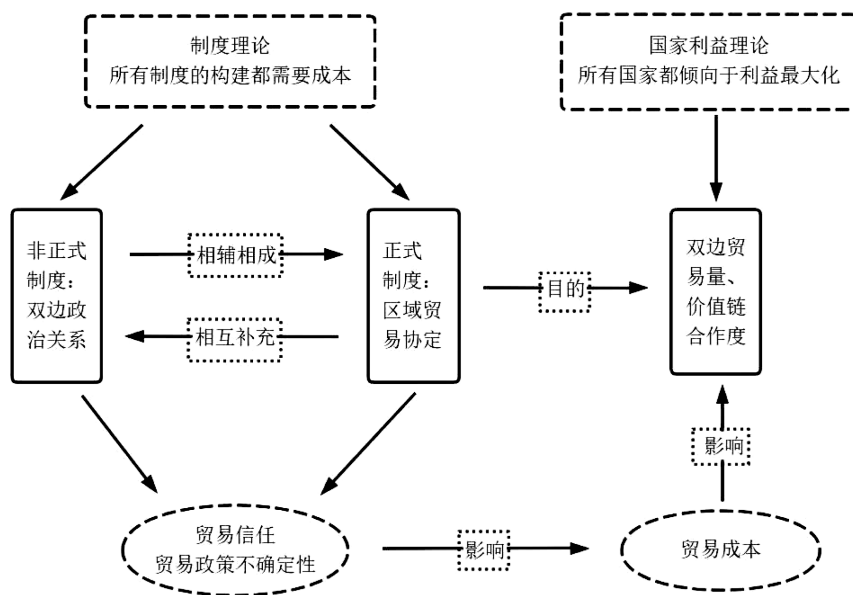


图 1 双边政治关系影响区域贸易协定深度的理论逻辑示意图

假说 3: 提升双边贸易量和加深价值链合作程度是促使双边政治关系疏远的国家签订更深层次区域贸易协定的重要原因。

三、计量模型设定及变量指标设置

(一) 计量模型设定

区域贸易协定深度的评价前提是国家之间已经签订区域贸易协定, 否则深度为零。而本文的研究样本包含的是已签订协定的双边国家, 这会导致经过筛选的样本不能代表总体, 从而造成样本选择问题。本文参考刘斌和王乃嘉 (2016)^[46] 的方法, 利用 Heckman 两阶段模型克服国家是否签订区域贸易协定的样本选择性问题。

双边政治关系对区域贸易协定深度的影响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家间是否签订协定的 probit 模型，第二阶段是协定深度模型（OLS 模型）。其中 Heckman 第一阶段的国家间签订协定模型为：

$$\Pr(\text{agreement}_{cdt} = 1) = \varphi(\alpha_0 + \alpha_1 \text{political}_{cdt} + \alpha \text{Controls} + \mu_c + \mu_d + \mu_t + \varepsilon_{cdt}) \quad (1)$$

其中，下标 c 和 d 代表国家， t 代表年份；被解释变量 agreement_{cdt} 代表国家间签订区域贸易协定的虚拟变量 $\{0, 1\}$ ，当国家 c 和国家 d 在第 t 年区域贸易协定签订数大于 0 时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political_{cdt} 代表国家 c 和国家 d 在第 t 年的双边政治关系距离，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 Controls 为控制变量集合；由于第一阶段使用 probit 模型估计，因此 μ_c 和 μ_d 分别为国家 c 和国家 d 的个体效应，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国家因素； μ_t 为时间效应，用于控制对各国均相同且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在第二阶段本文使用 OLS 模型估计，因而 μ_c 、 μ_d 和 μ_t 控制的是国家和时间的固定效应； ε_{cdt} 为随机扰动项。为了进一步控制国家间不随时间变化的“国家对”特征，本文的回归分析都将聚类到国家对层面上。Heckman 第二阶段的协定深度模型为：

$$\text{depth}_{cdjt} = \beta_0 + \beta_1 \text{political}_{cdt} + \beta \text{Controls} + \text{imr}_{cdjt} + \mu_c + \mu_d + \mu_t + \varepsilon_{cdjt} \quad (2)$$

其中， depth_{cdjt} 代表区域贸易协定 j 的深度， imr_{cdjt} 代表逆米尔斯比率。其余变量与式（1）中的相同符号变量含义一致。

（二）变量指标设置

1. 被解释变量：区域贸易协定深度

区域贸易协定深度指标主要考察协定政策领域的覆盖范围，Horn 等（2010）^[47] 统计出 52 个在区域贸易协定中重复出现的政策领域。本文主要参照 Hofmann 等（2017）的做法采取总深度指数衡量，其定义为区域贸易协定所包含条款的加总，具体衡量标准为：

$$\text{Totaldepth} = \sum_{k=1}^{52} \text{provision}_k \quad (3)$$

若区域贸易协定包含条款 k ，则 $\text{provision}_k = 1$ ；若区域贸易协定未包含条款 k ，则 $\text{provision}_k = 0$ 。

2. 解释变量：双边政治关系距离

本文参照 Bailey 等（2017）^[48] 以项目反应理论模型测算出各国理想点，以理想点差值的绝对值衡量双边政治关系。若两国理想点差值较小，说明两国在某一年的外交政策偏好较为相似，双边政治关系更亲密；反之，若两国理想点差值较大，则表明两国在某一年的政治关系较疏远。

3. 控制变量和 Heckman 第一阶段的外生变量

根据现有研究，本文在解释变量中引入以下控制变量：（1）两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参考王珏等（2019）^[49] 运用两国当年的 GDP 表示；（2）两国的人口数量情况，以两国的人口总数（ population1 、 population2 ）衡量；（3）两国间贸易状况，以双边贸易流量（ trade flow ）衡量；（4）两国间投资状况：以两国的外国直接投

资净流入 (*net FDI inflow1*、*net FDI inflow2*) 衡量; (5) 两国间文化差异 (*culture*), 参考王珏等 (2019) 以两国是否通用一种官方语言衡量, 若两国共用一种语言, 则 *culture* 取值为 1, 否则为 0; (6) 两国间殖民关系 (*colonial relation*), 以 1945 年之后两国是否存在殖民关系衡量, 若存在, 则 *colonial relation* 取值为 1, 否则为 0。

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 本文采取两国首都间地理距离作为 Heckman 第一阶段的外生变量, 其原因是: 国家间的地理距离会对国家签订区域贸易协定的决策产生显著影响 (Baier and Bergstrand, 2004), 因而满足相关性条件。但地理距离并不会直接对所签订协定的深度产生显著影响, 因为在确定签订区域贸易协定后, 决定协定深度的因素将变为各国出于经济利益、政治安全等因素主动作出的一种战略部署, 因而地理距离满足外生性条件, 说明外生变量的选择是合理的。

(三) 数据使用说明

本文在实证中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三个数据库, 分别为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库、贸易协定内容数据库和 Gravity 数据库。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说明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depth</i>	区域贸易协定总深度的对数	28 309	5.782	1.341	2.079	8.134
<i>agreement</i>	是否签订区域贸易协定	512 045	0.057	0.232	0	1
<i>political</i>	两国的政治关系	512 044	0.968	0.793	3.40e-06	5.175
<i>culture</i>	两国有共同的官方语言 或主要语言	481 686	0.165	0.371	0	1
<i>colonial relation</i>	两国在 1945 年后是否 曾处于殖民和被殖民关系	481 686	0.007	0.086	0	1
<i>GDP1</i>	国家 1GDP 的对数	479 618	16.384	2.416	9.488	23.616
<i>GDP2</i>	国家 2GDP 的对数	474 016	16.166	2.420	9.488	23.616
<i>population1</i>	国家 1 人口数的对数	492 200	8.577	2.031	2.248	14.131
<i>population2</i>	国家 2 人口数的对数	486 490	8.567	2.091	2.248	14.131
<i>trade flow</i>	两国间贸易流量的对数	229 012	7.929	3.690	0.001	19.834
<i>net FDI inflow1</i>	国家 1FDI 净流入的对数	406 790	19.308	3.005	2.303	27.322
<i>net FDI inflow2</i>	国家 2FDI 净流入的对数	413 047	19.045	2.960	2.303	27.322
<i>distance</i>	两国首都间地理距离的对数	481 686	8.752	0.760	4.394	9.899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

本文在基准回归中利用 Heckman 两阶段模型检验双边政治关系对区域贸易协定深度的影响效应，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第 (1) 列的因变量为国家是否签订区域贸易协定 (*agreement*)，结果显示：两国政治关系越亲密，签订区域贸易协定的概率越高，验证了前文提出的假说 1。本文还发现 IMR 的 VIFs 值小于 10，说明在第二阶段中加入 IMR 不会造成多重共线性问题。在第二阶段中，IMR 系数在 1% 的水平上呈负向显著，表明本文模型存在一定程度的样本自选择问题，因此选取 Heckman 两阶段模型具备合理性。表 2 第 (2) 列报告了 Heckman 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表明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对区域贸易协定深度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即双边政治关系较差的国家在签订区域贸易协定时，更偏重于提高协定的完备性以降低相互之间不信任带来的风险问题，从而会签订更深水平的区域贸易协定。

表 2 Heckman 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Heckman 第一阶段 (是否签订)	Heckman 第二阶段 (协定深度)
	(1)	(2)
	<i>agreement</i>	<i>depth</i>
<i>political</i>	-0.3332*** (0.0192)	0.8410*** (0.0396)
<i>distance</i>	-0.8380*** (0.0249)	
<i>imr</i>		-0.3893*** (0.0422)
常数项	23.1628*** (1.2900)	-4.0240*** (0.9292)
控制变量	是	是
观测值	348 036	39 619
R ²	0.4764	0.7347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注：括号中的值为稳健标准误差，*、**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由于文章基准回归中 Heckman 第一阶段使用了 probit 模型回归，故控制了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第二阶段中本文使用了 OLS 模型估计，故控制的是固定效应。下表同。

(二) 机制分析

从制度理论角度分析，当双边政治关系（非正式制度）存在问题影响到双边经贸合作时，需要提高区域贸易协定（正式制度）的深度以增强其对成员国的约束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双边国家在政治关系上的不足。因此，本小节通过设定双边政治关系与区域贸易协定深度的交互项表示这一互补关系，具体结果如表 3 所示。

其中，本文参考了彭冬冬和林珏（2021）关于 GVC 合作度指标的核算方法，

将两国价值链合作度定义为：

$$VCC_{cdit} = \frac{MVA_{cdit} + MVA_{dcit}}{EXP_{cit} + EXP_{dit}} \quad (4)$$

在式(4)中,下标*c*和*d*代表国家,*i*代表行业,*t*代表年份。 VCC_{cdit} 代表国家*c*与国家*d*的*i*行业在第*t*年的价值链合作度,该值越大表明两国间价值链合作程度越深; MVA_{cdit} 和 MVA_{dcit} 分别代表国家*c*的*i*行业对世界各国出口中包含的国家*d*的增加值、国家*d*的*i*行业对世界各国出口中包含的国家*c*的增加值; EXP_{cit} 和 EXP_{dit} 分别代表国家*c*和国家*d*的*i*行业对世界各国的出口总额。

本小节中的回归已对交互项进行中心化处理,根据表3第(1)列和第(2)列的估计结果,区域贸易协定总深度与双边政治关系的交互项($depth \times political$)和双边贸易量($trade\ flow$)、价值链合作程度($GVC\ cooperation$)这两个自变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在双边政治关系较差的条件下,缔结更深层次区域贸易协定能够补充双边政治关系疏远的不足,从而推动国家间贸易量的提升并加深价值链合作度,从而验证了双边政治关系较差的国家会签订更深层次区域贸易协定的动机。

表3 机制分析结果

变量	(1)	(2)
	<i>trade flow</i>	<i>GVC cooperation</i>
$depth \times political$	0.5001*** (0.0605)	0.3270*** (0.0537)
<i>depth</i>	0.1259*** (0.0399)	-0.0356 (0.0427)
<i>political</i>	-0.9355*** (0.0647)	-0.8220*** (0.0674)
常数项	-30.9793*** (2.2082)	-38.6589*** (1.7394)
控制变量	是	是
观测值	42 447	33 732
R ²	0.7563	0.6827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三) 稳健性检验^①

1. 重构被解释变量

为验证结果的稳健性和可靠性,本文参考 Hofmann 等(2017)的方法,采取核心深度指数衡量区域贸易协定的深度。Damuri(2012)从经济角度分析出更具有意义的18个核心领域,具体包括在区域贸易协定中出现频率最高的WTO+条款以及WTO-X条款中的竞争政策、知识产权、投资和资本流动。并且,几乎90%的

^①本文在稳健性检验部分,还进行了剔除国际重大事件冲击和双边政治关系非线性效应两个检验,限于篇幅未放入文中,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登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刊文补充数据查询”栏目查阅、下载。

协议至少包括一项核心条款，三分之一的区域贸易协定中包括所有核心条款（Hofmann et al., 2017）。核心深度指数的衡量标准具体为：

$$Coredepth = \sum_{k=1}^{18} provision_k \quad (5)$$

与总深度指数类似，若条款 k 在区域贸易协定中被提及，则赋值为 1，即 $provision_k = 1$ ，否则为 0。表 4 第（2）列报告了以核心深度指数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在更换协定深度的衡量指标后，双边政治关系对区域贸易协定深度的效应与基准回归结果相一致，证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2. 标准化处理

本文参考高疆和盛斌（2018）^[50] 的研究对区域贸易协定深度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Totaldep = \frac{Totaldepth}{Max(Totaldepth)} = \frac{\sum_{k=1}^{52} provision_k}{Max(Totaldepth)} \quad (6)$$

其中， $Totaldep$ 表示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总深度指数， $Totaldepth$ 表示总深度指数。 $Max(Totaldepth)$ 表示区域贸易协定总深度指数的最大值。表 4 第（4）列报告了对区域贸易协定总深度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后的回归结果，发现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对区域贸易协定深度存在抑制效应，这与基准回归结果相一致。

表 4 双边政治关系对区域贸易协定深度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I

变量	Heckman	Heckman	Heckman	Heckman	Heckman	Heckman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1)	(2)	(3)	(4)	(5)	(6)
	<i>agreement</i>	<i>Coredepth</i>	<i>agreement</i>	<i>depth</i>	<i>agreement</i>	<i>depth</i>
<i>political</i>	-0.3332*** (0.0192)	1.2510*** (0.0567)	-0.3332*** (0.0192)	0.0980*** (0.0047)		
<i>var</i>					-0.3609*** (0.0199)	0.9344*** (0.0431)
<i>distance</i>	-0.8380*** (0.0249)		-0.8380*** (0.0249)		-0.8333*** (0.0252)	
<i>imr</i>		0.3518*** (0.0743)		-0.0446*** (0.0049)		-0.3808*** (0.0411)
常数项	23.1628*** (1.2900)	19.3435*** (1.8698)	23.1628*** (1.2900)	-0.4408*** (0.1071)	23.4053*** (1.2875)	-4.3560*** (0.947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48 036	39 619	348 036	39 619	348 036	39 619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3. 剔除极端值

本文采取剔除核心解释变量极端值的方法，分别在双边政治关系变量中的第

10 和第 90 百分位进行缩尾（符号为 *var*）。从表 4 第（5）列和第（6）列可以看到，双边政治关系的估计系数在 1% 的水平上依然显著稳健。

4. 更换解释变量

本文运用投票相似性指数替代理想点距离进行回归。投票相似性指数在 0 到 1 之间，取值越大说明两国对同一议题的态度或看法越相似，即双边政治关系越亲密。根据表 5 第（1）列和第（2）列的估计结果，双边政治关系越疏远的国家，所缔结区域贸易协定的深度越深，这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5. 更换回归方法

本文中的区域贸易协定总深度的范围在 8 到 5 174 之间，属于计数离散变量，符合泊松分布特征，因此本小节采取泊松回归进行估计。从表 5 第（3）列可以看到，双边政治关系对区域贸易协定深度存在显著影响，再次证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表 5 双边政治关系对区域贸易协定深度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II

变量	Heckman 第一阶段	Heckman 第二阶段	Poisson
	(1)	(2)	(3)
	<i>agreement</i>	<i>depth</i>	<i>depth</i>
<i>agree</i>	1.4261 *** (0.1221)	-4.3410 *** (0.2053)	
<i>political</i>			0.4555 *** (0.0296)
<i>distance</i>	-0.8530 *** (0.0258)		
<i>imr</i>		-0.4278 *** (0.0425)	
常数项	21.2474 *** (1.2871)	-0.4683 (0.9050)	-0.1013 (1.735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观测值	348 036	39 619	42 447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四）内生性问题处理

由于双边政治关系与区域贸易协定深度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区域贸易协定签订和深度的提升也会对双边政治关系产生影响；此外，回归模型可能遗漏了一些同时影响双边政治关系和区域贸易协定深度的变量，存在着一定的内生性问题。为进一步验证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借鉴王珏等（2019）的方法，以一国与其他（除对象国外）国家的政治关系总距离作为该国与对象国双边政治关系距离的

工具变量。选取该工具变量的合理性在于，一国与其他（除对象国外）国家的政治关系总距离与对象国的政治关系距离具有较好的相关性，同时又不太可能直接影响到两国间签订区域贸易协定的深度。此外，还参考杨连星等（2016）^[51]的做法，采取以下两种方法处理内生性问题：首先本文采取双边政治关系的滞后一期和两期变量作为当期双边政治关系的工具变量；其次，由于双边政治关系较差的国家在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理念也相差较大，因此本小节在控制变量中继续加入制度差异、宗教差异和民主程度差异三个指标以减少因遗漏变量而造成估计结果不准确的问题^①。

表6报告了采用一国与其他国家的政治关系总距离作为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与上文中的分析基本一致。表7第（1）列至第（4）列分别报告了采用双边政治关系的一期、二期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的两阶段回归结果，发现双边政治关系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加入制度差异、宗教差异和民主程度差异等可能遗漏变量的基础上，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具体结果见表7第（5）列和第（6）列。综上可知，在进行内生性问题处理后，本文的结论依然稳健。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在两阶段工具变量估计过程中，第一阶段的F值大于10，表明本文选择的工具变量并非弱工具变量（Stock and Staiger, 1997）^[52]；本文只使用一个工具变量，因此不会出现过度识别问题。

表6 双边政治关系影响区域贸易协定深度的内生性问题处理 I

变量	Heckman 第一阶段	Heckman 第二阶段
	(1)	(2)
	<i>agreement</i>	<i>depth</i>
<i>political</i>	-0.3332 *** (0.0065)	0.8404 *** (0.0396)
<i>distance</i>	-0.8379 *** (0.0064)	
<i>imr</i>		-0.3857 *** (0.0423)
常数项	23.1621 *** (0.4945)	
控制变量	是	是
观测值	348 036	39 619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①全球治理指标（WGI）主要有六个维度：话语权和问责制、政治稳定性、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法治、腐败控制。本文以六个指标的平均值衡量一国制度环境，以两国制度环境差异的绝对值作为双边制度差异的衡量标准。其中民主程度指标采取WGI中的话语权和问责制指标，以两国民主程度差异的绝对值来衡量。而宗教差异指标来源于Gravity数据库的共同宗教指数，该指数取值在0到1之间。若两国通用一种宗教，或两国国内大部分民众均信仰同一宗教，指数取值为1，否则为0。

表7 双边政治关系影响区域贸易协定深度的内生性问题处理 II

变量	Heckman 第一阶段	Heckman 第二阶段	Heckman 第一阶段	Heckman 第二阶段	Heckman 第一阶段	Heckman 第二阶段
	(1)	(2)	(3)	(4)	(5)	(6)
	<i>agreement</i>	<i>depth</i>	<i>agreement</i>	<i>depth</i>	<i>agreement</i>	<i>depth</i>
<i>political</i>	-0.3646 *** (0.0070)	0.9599 *** (0.0436)	-0.3659 *** (0.0070)	0.9732 *** (0.0441)	-0.0571 ** (0.0266)	0.5279 *** (0.0338)
<i>institutional</i>					-0.0662 ** (0.0298)	-0.0248 (0.0330)
<i>religious</i>					0.2431 *** (0.0647)	-0.9133 *** (0.0716)
<i>democracy</i>					-0.3377 *** (0.0284)	0.4356 *** (0.0365)
<i>distance</i>	-0.8267 *** (0.0065)		-0.8251 *** (0.0065)		-0.9326 *** (0.0296)	
<i>imr</i>		-0.4605 *** (0.0442)		-0.4803 *** (0.0441)		-0.4026 *** (0.0391)
常数项	22.9825 *** (0.4957)		22.8418 *** (0.4965)		51.8780 *** (1.6077)	-4.4098 *** (0.988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47 852	39 469	347 681	39 356	206 383	32 800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五、异质性分析

(一) 制度差异的异质性分析

本小节实证分析不同制度差异水平下双边政治关系对区域贸易协定深度的影响效应，表8第(2)列表明在双边政治关系较差且制度差异大的国家间所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更深，在双边政治关系较差但制度差异小的国家间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相对较浅。这表明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政治关系恶化对签订区域贸易协定的影响，与本文的理论分析相一致。

(二) 区域贸易协定的异质性分析

据WTO统计，在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中，FTA层级以上的区域贸易协定（主要包括FTA、CU、FTA&EIA和CU&EIA四类）占大多数。FTA和CU虽同属货物

贸易领域，但相比 FTA，CU 对缔结方的约束力度更强，限制了缔约国家对外推行独立贸易政策的自由度。而 FTA&EIA 和 CU&EIA 这两类区域贸易协定囊括了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两大领域，条款所涉及的范围比 FTA 和 CU 更广泛。

表 8 基于制度差异的异质性检验

变量	Heckman 第一阶段	Heckman 第二阶段
	(1)	(2)
	<i>agreement</i>	<i>depth</i>
<i>political # smaller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i>	-0.2696 *** (0.0238)	0.6246 *** (0.0390)
<i>political # bigger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i>	-0.3667 *** (0.0206)	0.9142 *** (0.0415)
<i>distance</i>	-0.8401 *** (0.0251)	
<i>imr</i>		-0.3701 *** (0.0424)
常数项	23.6107 *** (1.2958)	-3.6338 *** (0.9569)
控制变量	是	是
观测值	348 036	39 619
R ²	0.4770	0.7414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从表 9 第 (1) 列与第 (3) 列可以看到，政治关系对 FTA+FTA&EIA 签订概率的影响不显著，但其对深度存在正向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在已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中，FTA 和 FTA&EIA 签订数占大部分，而且国家间在缔结区域贸易协定时偏向 FTA 这一类型，因而政治因素在促进 FTA 签订时的作用不大。但由于 FTA 本身约束力较弱，缔约方仍然保留着一定程度上自由制定对外贸易政策的选择，因而双边政治关系较疏远的国家在签订 FTA 时会注重提升深度以约束双方，保障贸易协定的推行。根据表 9 第 (2) 列和第 (4) 列的结果，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有利于提高国家签订 CU 的概率，但是对协定深度不存在显著影响。这很可能是由于 CU 本身在条款上对成员的约束力度较强，所以在缔结 CU 时国家对于提升协定深度的需求不大，从而导致政治因素对这类协定深度的影响不显著。

表9 基于区域贸易协定不同类型的异质性检验

变量	Heckman 第一阶段		Heckman 第二阶段	
	(1)	(2)	(3)	(4)
	<i>FTA+FTA&EIA</i>	<i>CU+CU&EIA</i>	<i>FTA+FTA&EIA</i>	<i>CU+CU&EIA</i>
<i>political</i>	0.0466 (0.0333)	-0.8372 *** (0.0536)	0.4620 *** (0.0460)	-0.0273 (0.0215)
<i>distance</i>	-0.5869 *** (0.0401)	-0.9174 *** (0.0510)		
<i>imr</i>			-1.7483 *** (0.1271)	0.1017 *** (0.0354)
常数项	17.5162 *** (1.4664)	-25.1356 *** (2.7306)	-15.9582 *** (1.4814)	2.6202 * (1.478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72 575	121 026	15 228	9 713
R ²	0.4394	0.5666	0.8853	0.9472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三) 双边政治关系距离的异质性分析

本小节选取了20%、40%、60%和80%这四个分位点进行分位数回归，以考察随着双边政治关系分布的由低到高，其对区域贸易协定深度的差异化影响，具体估计结果见表10。可以看到，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中双边政治关系对不同分位点区域贸易协定的签订以及深度基本上都具有显著影响，并且随着双边政治关系的分布由低端向高端变化，其估计系数也在逐渐上升，与基准回归结论基本一致。

表10 分位数回归

变量	Heckman 第一阶段	Heckman 第二阶段
	(1)	(2)
	<i>agreement</i>	<i>depth</i>
<i>political</i> (<20%)	-0.0970 (0.1232)	0.1285 (0.0855)
<i>political</i> (20%~40%)	-0.1289 ** (0.0598)	0.2328 *** (0.0514)
<i>political</i> (40%~60%)	-0.2206 *** (0.0384)	0.5486 *** (0.0451)
<i>political</i> (60%~80%)	-0.2382 *** (0.0250)	0.6583 *** (0.0391)
<i>political</i> (>80%)	-0.3358 *** (0.0213)	0.8379 *** (0.0405)
<i>distance</i>	-0.8476 *** (0.0250)	
<i>imr</i>		-0.3494 *** (0.0435)
常数项	23.0217 *** (1.2903)	-3.1141 *** (0.8875)
控制变量	是	是
观测值	348 036	39 619
R ²	0.4770	0.7389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当前全球范围内区域贸易协定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协定所涵盖的政策领域也逐渐呈现出深度一体化趋势。本文从政治关系角度探讨区域贸易协定深度一体化的动力，进一步拓展了关于协定深度的研究视角。

本文使用1971—2015年的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和贸易协定内容数据库，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实证检验了双边政治关系对区域贸易协定深度的影响效应，得出以下结论：（1）亲近的双边政治关系有利于提高国家间签订区域贸易协定的概率，在已经确定签订协定的前提下，双边政治关系越差的国家对签订深度区域贸易协定的需求越大，本文从多角度进行稳健性分析以及内生性处理的结果均支持这一结论。（2）双边政治关系疏远的国家签订深度区域贸易协定的动机在于扩大贸易往来和提升价值链合作程度。（3）双边政治关系对区域贸易协定深度的促进效应会随关系疏远程度的增加而增强。（4）疏远的双边政治关系对不同类型区域贸易协定深度的效应呈异质性，相比于CU和CU&EIA，FTA和FTA&EIA这两类区域贸易协定深度受双边政治关系的影响更显著。（5）国家间制度差异越大，双边政治关系的疏远对区域贸易协定深度的促进作用越强。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1）中国在缔结区域贸易协定时可优先考虑政治往来密切的国家。因为中国与政治关系良好的伙伴国在缔结区域贸易协定时对深度协定的需求不大，签订一般深度的区域贸易协定便可满足两国经贸合作需求，且签订协定时更易就议题设置达成共识，从而有效降低谈判成本。（2）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正在急剧变化，我国在融入国际社会与各国开展经贸合作时，会面临来自政治关系疏远国家的阻碍。为避免可能存在的政治关系恶化对双边经贸往来造成的负面影响，中国应通过缔结规则明确、条款清晰的深层次区域贸易协定，构建深度的双边、多边和区域合作，增强国家间贸易互信，从而深化双边经贸往来。（3）基于当前区域贸易协定呈现深度一体化的趋势，中国在缔结区域贸易协定时应同时注重协定数量和质量两方面，摒弃单纯追求区域贸易协定数量的理念，并关注协定所覆盖的政策领域以契合中国当前的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 [1] 卢晓菲, 章韬. 全球价值链贸易对区域贸易协定发展的影响研究 [J]. 世界经济研究, 2020 (4): 46-59+136.
- [2] BAIER S L, BERGSTRAND J H, MARIUTTO R. 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Revisited: Distinguishing Sources of Interdependence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4, 22 (1): 31-58.
- [3] 张中元. 区域贸易协定的水平深度对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9, (8): 95-108.
- [4] LAWRENCE R Z. Regionalism, Multilateralism and Deep Integration [R]. Discussion Paper.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1996.
- [5] BALDWIN R. 21st Century Regionalism: Filling the Gap between 21st Century Trade and 20th Century Trade Rules [R]. WTO Staff Working Paper, Geneva: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2011.

- [6] OREFICE G, ROCHA N. Deep Integration and Production Networks: An Empirical Analysis [J]. *The World Economy*, 2014, 37 (1): 106-136.
- [7] DAMURI Y R. 21st Century Regionalism and Production Sharing Practice [R].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2012.
- [8] RUTA M.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Theory, Evidence, and Open Questions [R].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17 (8190).
- [9] BAIER S L, BERGSTRAND J H. 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4, 64 (1): 29-63.
- [10] EGGER P, LARCH M. Interdependent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 Memberships: An Empirical Analysi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8, 76 (2): 384-399.
- [11] CHEN M X, JOSHI S. Third-country Effects on the Formation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0, 82 (2): 238-248.
- [12] BALDWIN R, JAIMOVICH D. Are Free Trade Agreements Contagiou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2, 88 (1): 1-16.
- [13] FONTAGNÉ L G, SANTONI G. GVCs and the Endogenous Geography of RTAs [R]. CESifo Working Paper, 2018.
- [14] 铁瑛, 蒙英华. 移民网络、国际贸易与区域贸易协定 [J]. *经济研究*, 2020, 55 (2): 165-180.
- [15] GOWA J, MANSFIELD E D. Power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3, 87 (2): 408-420.
- [16] Mansfield E, Bronson 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jor-power Trade Flows [M] // Mansfield E, Milner H.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213-256.
- [17] MARTIN P, MAYER T, THOENIG M. The Geography of Conflicts and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012, 4 (4): 1-35.
- [18] PLOUFFE M, VAN DER STERREN R. Trading representation: Diplomacy's Influence on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J].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6, 18 (4): 889-911.
- [19] ANTRÀS P, STAIGER R W. Offshoring and the Role of Trade Agreement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2, 102 (7): 3140-3183.
- [20] NORTH D 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21] SCOTT W R.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M].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5.
- [22] 马智胜, 马勇. 试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关系 [J]. *江西社会科学*, 2004 (7): 121-123.
- [23] MANSFIELD E D, PEVEHOUSE J C, BEARCE D H. Preferential Trading Arrangements and Military Disputes [J]. *Security Studies*, 1999, 9 (1-2): 92-118.
- [24] 孙玉红. 跨区域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政治经济动机分析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8 (7): 72-78+5.
- [25] 祝丹丹. 政治参数对多边贸易协定影响的博弈分析 [J]. *全国流通经济*, 2020 (26): 28-31.
- [26] 王询. 组织内的正式与非正式关系 [J].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2000 (2): 3-7.
- [27] 李光宇. 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差异与链接 [J].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9, 15 (3): 146-152.
- [28] 孙家良. 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经济效率 [J]. *商业研究*, 2004 (6): 144-146.
- [29] 钱学锋, 龚联梅.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区域贸易协定与中国制造业出口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7 (10): 81-98.
- [30] SCHIFF M, WINTERS L A. Regional Integration as Diplomacy [J].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998, 12 (2): 271-295.

- [31] KASTNER S L. Does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Constrain, Inform, or Transform? Preliminary Evidence from the Relationship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C]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2005.
- [32] 刘凤委, 李琳, 薛云奎. 信任、交易成本与商业信用模式 [J]. 经济研究, 2009, 44 (8): 60-72.
- [33] 赵家章, 池建宇. 信任、正式制度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来自全球65个国家的证据 [J]. 中国软科学, 2014 (1): 43-54.
- [34] 马野青, 阮永嘉.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全球经济包容性增长——关税变动视角下的国家间溢出效应研究 [J]. 国际贸易问题, 2022 (6): 1-18.
- [35] HANDLEY K, LIMÀO N. Trade and Investment under Policy Uncertainty: Theory and Enterprise Evidence [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2015, 7 (4): 189-222.
- [36] 洪邮生.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一种经久不衰的主流范式 [J]. 历史教学问题, 2004 (4): 44-51.
- [37] 张玉环, 李巍. 自由贸易协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述评 [J]. 国际政治研究, 2014, 35 (2): 110-128+8.
- [38] PERRONI C, WHALLEY J. The New Regionalism: Trade Liberalization or Insurance? [J].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Revue Canadienne D'économique, 2000, 33 (1): 1-24.
- [39] FERNANDEZ R, PORTES J. Returns to Regionalism: An Analysis of Nontraditional Gains from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J].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998, 12 (2): 197-220.
- [40] 陈广汉, 杨柱. 区域性服务贸易协定的形成机制与影响因素——基于国别和地区的面板数据分析 [J]. 国际经贸探索, 2020, 36 (6): 4-24.
- [41] 刘斌, 李川川. 异质性贸易协定与返回增加值 [J]. 世界经济研究, 2021 (7): 34-48+135-136.
- [42] HASS E B. Beyond the Nation-state [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 [43] HOFMANN C, OSNAGO A, RUTA M. Horizontal Depth: A New Database on the Content of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R].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17 (7981) .
- [44] 彭冬冬, 林珏. “一带一路”沿线自由贸易协定深度提升是否促进了区域价值链合作? [J]. 财经研究, 2021, 47 (2): 109-123.
- [45] LAGET E, OSNAGO A, ROCHA N, et al. Deep Trade Agreements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J].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020, 57 (2): 379-410.
- [46] 刘斌, 王乃嘉.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的经验研究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6 (9): 59-74.
- [47] HORN H, MAVROIDIS P C, SAPIR A. Beyond the WTO? An Anatomy of EU and US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J]. The World Economy, 2010, 33 (11): 1565-1588.
- [47] BAILEY M A, STREZHNEV A, VOETEN E. Estimating Dynamic State Preferences from United Nations Voting Data [J].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017, 61 (2): 430-456.
- [49] 王珏, 李昂, 周茂. 双边政治关系距离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基于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的研究 [J]. 当代财经, 2019 (1): 96-107.
- [50] 高疆, 盛斌. 贸易协定质量会影响全球生产网络吗? [J]. 世界经济研究, 2018 (8): 3-16+135.
- [51] 杨连星, 刘晓光, 张杰. 双边政治关系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二元边际和投资成败视角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6 (11): 56-72.
- [52] STOCK J, STAIGER D. Instrumental Variables with Weak Instruments [J]. Econometrica, 1997, 65: 557-586.

Why Improved Bilateral Political Relations Will Reduce the Depth of RTAs

SUN Churen ZHAO Jiamin XU Jinqiang

Abstract: The blooming of RTAs is draw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ir depth.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ses the impact of bilateral political relations on the depth of RTAs through Heckman two-stage model. Results show that although improved bilateral political relations contribute to the probability of RTAs signing, they reduce the agreement depth. Further analysis explains that the motivation for signing RTAs in depth between two countries with estranged political relations is mainly to reduce the uncertainty of trade policies through formal rules, then to enhance trade flows and deepening value chain cooperation. The conclusions suggest that China should establish more RTAs in depth to enhance mutual trust in trade, and also narrow down the differences in bilateral political relations, so as to build up deep cooperation for bilateral, multilateral, and regional relations.

Keywords: Bilateral Political Relations;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Agreement Depth; Trade; GVC Cooperation

(责任编辑 白光)